

缪钺全集

第一卷(上)

冰茧庵读史存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

缪钺全集

第一卷（上）

冰茧庵读史存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缪钺全集. 第1卷, 冰茧庵读史存稿 / 缪钺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7
ISBN 7-5434-5422-X

I. 缪... II. 缪... III. ①缪钺-全集 ②中国-古代史-
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210 号

责任编辑 邓子平 高树海
装帧设计 慈立群 慈向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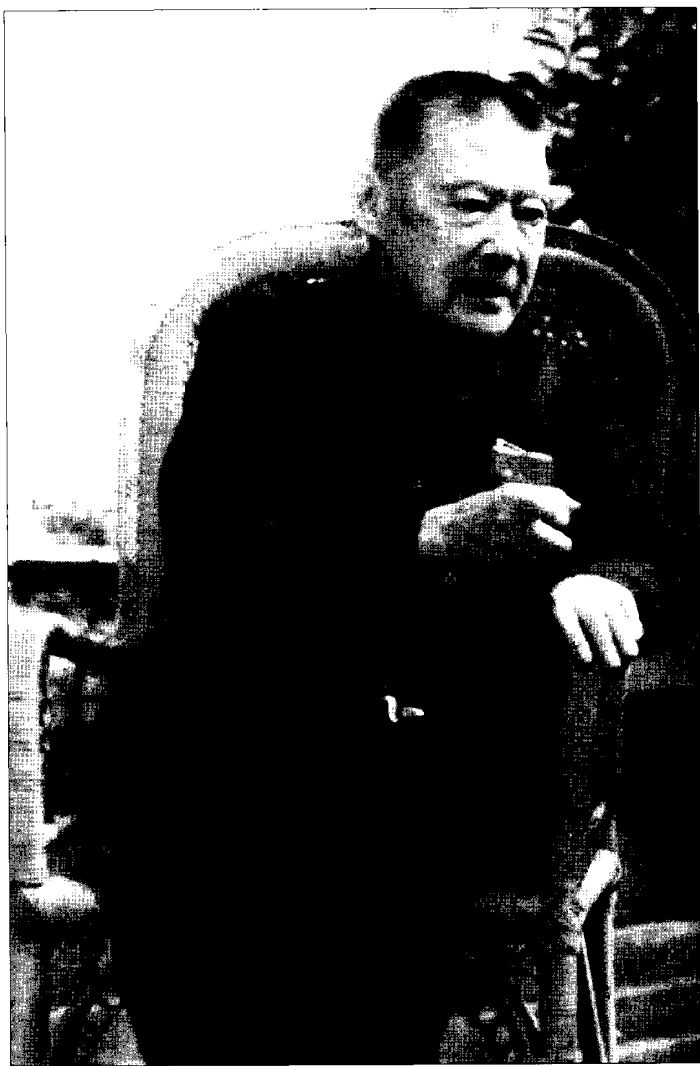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050061)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1/16
印 张 168.5
字 数 2510千字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22-X/I·908
定 价 260.00 元 (全八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707号中化大厦1101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作者像

出版说明

缪钺(1904—199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出版有专著十数种,学术分量厚重,受到学界普遍赞誉与广泛关注,影响巨大。缪钺先生工诗能词,创作了许多可耐讽诵的佳诗妙词。

本次整理出版的八卷本《缪钺全集》,是对缪钺先生一生学术成果和诗词创作的系统总结。全集采用按内容归纳整理的方式,科学、集中地展示了缪钺先生在各专题上的研究成果与创获。全集共分《冰茧庵读史存稿》,《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冰茧庵词说》,《〈三国志〉与陈寿研究》,《杜牧研究》,《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和《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冰茧庵序跋随笔》和《冰茧庵札记》,《冰茧庵诗词稿》八卷,由缪元朗、景蜀慧编校整理。

本次整理出版的八卷本《缪钺全集》,较之已出版的缪钺先生的十数种专著,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增收了二十九篇未刊手稿和油印稿,增收了一部未刊专著手稿《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二是收录了五十三篇1949年建国前发表的现仍具有重要学术分量和学术价值的论文,收录了1949年建国前刊印的专著《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重新整理编校了《冰茧庵诗词稿》。这些论文和书稿,现在已经很难一见。三是对全集的内容均进行了仔细的校对与润色,审读专家和责任编辑核定了大量的引文(原始资料),通过各卷之间的互校发现和解决了一些以往未曾注意而又比较重要的问题。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5月

通贯古今 回翔文史

——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代前言）

缪元朗 景蜀慧

缪钺先生，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后随家寓居保定。1922年先生中学毕业，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24年冬，因父亲逝世，先生遂辍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抗日战争以前，先生先后任教于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志存中学、省立保定中学高中部，除每周教课十馀学时外，其余时间均刻苦自学，非星期天皆住校（据原培德中学学生任绩先生回忆）。当时相与往还论学者，师长有张效直先生，友人有李濂镗（杏南）、梁国常（鹤铨）、薛声震（效宽）、高苏垣诸君。在此期间，曾于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年，与刘子植（节）先生过从颇密，深得切磋之益。1935年秋又曾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一年，与龙榆生、谭其骧诸先生定交。抗战军兴，先生携家南下，经开封、武汉抵达重庆。时浙江大学已内迁至广西宜山，先生于1938年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时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执掌下，人才济济，与先生往来最密者有郭斌龢、萧璋、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张荫麟、谭其骧、贺昌群、方豪、陈乐素、钱宝琮、章俊之、陈逵等，外来学者至浙江大学短期讲学与先生相得甚契者有马一浮、刘永济、钱穆诸人。抗战胜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未能随浙江大学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之聘，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常与闻在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叶石荪（麐）先生往还论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先生仍任原职。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遂专任四川

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1月6日病逝于成都。

先生少承庭训，在中学毕业以前，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学的知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章太炎先生在古文声训之学上的精深造诣与论述经史之超卓识解，深为佩服。以后治学亦能博览清代学者著述而兼采诸家之长，如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的识解贯通，钱（大昕）、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的考证精核，而尤慕汪中的“博极群书，文藻秀出”，且毕生推崇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世致用之学。近代学者中，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张先生精研文史哲之学，兼有浙东学者之博通与浙西学者之专精，先生治学，深受其沾溉。先生又喜读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著作，在思想学术上服膺两先生之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1944年后，先生还曾与陈寅恪先生通函请益，更得陈先生学术之影响。除受益于上述前辈学者之外，先生平生交游中，相与研讨学术、深得切磋之益者，尚有吴宓、贺麟、夏承焘、谢国桢、熊德基、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邓广铭、史念海、陈槃、劳榦、周一良、杨联升、韩国磐、苏渊雷等先生。

先生治学，早在执教中学时即已开始，七十年中，著述斐然可观。所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出版的专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合撰）、《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撰）等。此外，还编写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三国志选》及普及读物《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杜甫》、《杜牧诗选》；又主编《三国志选注》、《三国志导读》等。晚年还主持编撰了《北朝会要》。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先生的研究涉及思想、文化、经济、民族、人物诸多方面。其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先秦诸子与儒学，先生发表了《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书札》、《论荀学》、《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论〈墨经〉的撰著时代》、《〈吕氏春秋〉错简》等文章。在这些早年所作的文章中，虽有先生晚年认为“还拟多作修

改”者，如《〈吕氏春秋〉撰著考》^①，但多不乏真知灼见。20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又发表了《读〈二程全书〉》的长篇书评，详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宋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样体现了先生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

在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同时，先生对20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之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48年先生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又与古时不同。今日之中国，因受西洋影响，一切皆在蜕故变新之中，学术自亦不能例外。如徒读古书，不能接受新见解、新方法，则食古不化，非徒无益，且反为学术进步之梗。然若只能采用新见解、新方法，而古书根底浅薄，了解不深，论述多误，则亦不能胜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之责任。”^②这些见解的来源可追溯到多年前在浙江大学时的阅读实践，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诚恳地写道：“执友吴宓、郭斌龢两先生常劝我多读西方学者之书，并加以帮助，可惜我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愧负良友。”^③当时先生在郭先生的帮助下，读了英译本《柏拉图语录》、安诺德《文学评论集》、罗色蒂兄妹之诗、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等西文著作。这种阅读的结果之一，便是《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的发表。先生在该文的开头写道：“吾近读叔本华之书，对于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思想见解，更有新悟，爰抒所得，草成此篇。”^④这篇探讨王国维性格和思想特征的论文非常成功，三十年后，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论及王氏性格，尚能见其影响^⑤；而到20世纪末的1995年，还有学者回顾指出：“缪钺在大陆王学史上的地位更不容小觑，因为他在40年代写的《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堪称中国第一篇从发生学角度揭示王氏为何接受叔氏的心理动因的影响比较专论。他指出：‘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

① 详见缪钺《冰茧庵丛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朱自清先生追悼会特刊》。

③ 缪钺《自传》，《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页。

④ 缪钺《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68页。

⑤ 详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一编第一章，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版。

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惟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详密，乃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其了解而欣赏之，远较读他家哲学之为易……’可以说，若无皓首穷极王氏、叔氏原著精髓之功力，与潜心洞烛巨魂之睿智，想必谁也道不出这番穿透力极强之高论。”^① 20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另有一篇有关西学的文章《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篇〉》，在今天读来，犹见思考之深而有针砭时弊之意义。针对清末以来中西学体用关系之争，先生指出：

体用一源，未可截而为二，有甲体即有甲用，有乙体则必有乙用，故中学之体，自产生中学之用，反之，如欲得西学之用，亦必先研求西学之体也。所谓西学之用，国人以肤浅之观察最易见者，即其机械之巧、制造之精、工业之盛（尤其清末人所见大都如是）。实则西学之用，并不止于此，此不过其一端而已。然即此一端，亦非仅工匠之能事，实赖科学家之智慧，而推源于追求真知之精神。此种精神，古希腊人已深具之。文艺复兴以来，特为发扬光昌，遂有近三百余年欧西灿烂之文明。返观吾国民族，自古即缺乏这种追求真知之精神。西方学者，论古希腊哲学率谓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哲学为衰退时期，因其只注重实用，无复前人为真知而求真知之科学精神，殆已落入第二义。若本此意见以衡量吾国先秦诸子，其不落于第二义者几希。惟所谓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颇能以纯逻辑方法探求事物之本性。然重实用之中国民族，不能欣赏此种纯理智之探讨，故辩者之学，在当时为诸家所排，西汉以后，光沉响绝。中国民族不能产生科学，固无足怪。抗战以还，创巨痛深，国人深切感知，苟非积极科学化、工业化，此后吾中华将不能立国于天地之间。故提倡科学振兴工业之声盈于朝野，此固可喜之现象。窃以为犹当更进一步，求其本原，即培养国人纯理性的追求真知之精神。吾国民族虽缺乏此

① 聂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208页。

种精神，然并非绝无也。先秦时则有惠施、公孙龙等辩者之学；魏晋玄言，论“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探求事物本性，而不重实用之目的。两宋理学，一方面虽似带有宗教性，而另一方面亦极重穷理致知。再观史籍及各家文集所载，畸人俊士具有科学精神者，亦偶或遇之。惟此一粒追求真知之种子，在中国民族性中，发育不善，其力甚微，故至今国人思想犹多陷于阴阳五行，冬烘迷信。此后当尽量培养而发扬之，庶几中国可以产生纯逻辑、纯哲学、纯科学。^①

这段论述对中外古今观照融通，不囿陈说，独运睿思，可见先生研究西学之学术素养和水准。此后数十年间，除在20世纪80年代间撰写了《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外，先生没有再发表过有关西学研究的文章，但阅读西学之书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晚年（50年代更开始阅读马列及苏联学者的著作）。80年代，杨联升教授从国外给先生寄来了一些西文书，国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西方理论书籍，先生在阅读上甚为用力。一些理论方法如接受美学、诠释学、意识批评、法国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等，都曾被先生不著痕迹地运用于晚年撰写的论著之中。

抗战结束以后，先生因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之故，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的范围涉及此一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和历史人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北朝之鲜卑语》均有创新之见解。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为先生在魏晋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针对传统的清谈误国论，先生以缜密的文思、精核的考辨、清疏隽雅的文笔，辩驳清理旧说，对魏晋清谈之性质、特点、不同发展时期与政治的不同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指出清谈政治在东晋时所起到的安内攘外之作用以及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形象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其文体现了先生治史的识见功力，为以后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

① 《思想与时代》第31期，1946年2月。

奠定了新的基础。到 20 世纪末，此文作为学术经典，收入王元化等主编的《释中国》一书。《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代表了先生建国以前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方面业已臻达的研究水平。文章从对东魏北齐历史上几次重大政争的分析入手，通过深入细密的史实考辨，揭示这些政争后面所隐含的矛盾冲突的历史真相，并从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族士大夫改良朝政的失败，说明了高氏政权不能解决其境内民族融合的重大问题，故为北周所灭乃有以然也。其文运用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阐述之民族观，对史家研究较少的北齐之政治与民族进行了透辟独到的探索，其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陈先生的观点，并有所补充。1962 年，先生曾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十四篇论文编为一册，名《读史存稿》，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国内外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非常熟悉的专书。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先生特属意于魏晋南北朝文士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了论述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自己也发表了如《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札记》等文章，并撰写了关于谢灵运的一系列札记。

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和《杜牧传》、《杜牧年谱》。《颜之推年谱》为创新之作，因资料详尽、考证精当而常为研究者所称引。《元遗山年谱汇纂》是综合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廷四家《元遗山年谱》，取长补短、拾遗订误而重新编写的，其中特别详述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及其生平交游事迹，以见当时文坛风气。钟山书局在 1935 年，以《国风》半月刊第 7 卷第 3 期、第 5 期专号的形式出版，为先生所发表的的第一部专著。199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元好问全集》，主编姚奠中征得先生同意，将《年谱》作为附录收入《全集》，并在该书《前言》中说“缪钺教授

《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1935年，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足资参证”。^① 可惜因编者移录之误，致使其错讹甚多，实为遗憾。《杜牧年谱》之初稿完成于1940年，同年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其后又旁稽群籍，校订疏误，弥补缺漏，于1964年重新写定，“文革”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刊行。在《年谱》的基础上，先生还写成了《杜牧传》一书，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牧年谱》因为是开创之作，在学术界颇受重视，一些杜牧研究者认为“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颇为详备，对研究杜牧及其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但也因为是草创之作，其中考证不免有疏误之处，尤其在诗文编年方面，故此后又学者发表文章，进行补正。对先生在此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有非常公正中肯的评价：“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十年来，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③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先生早在三十岁时即著长文《典籍述略》并发表于《国风》，显示了“考镜源流”的学术素养和坚实的文献学功底。以后在此方面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三国志》的注释上。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丛书，用作高校“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教材。先生承担了《三国志选》的编选和注释工作，1962年8月编成，全书约二十万字，共选注纪、传十九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在建国后众多《三国志》选注本中，是问世很早而且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一种。首先，从选录的标准来看，除选政治、军事人物外，对那些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科技创造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以及周边的少数民族，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体现了当代学者认识三国历史的新观点、新视角。其次，全书的注释虽然在文字上力求简明通俗，

① 《元遗山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② 胡可先《杜牧诗文编年考证》，《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③ 傅璇琮《〈杜牧论稿〉序》，见吴在庆著《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但在内容上却极为精当。正因为有上述优点，所以出版之后受到高校师生和普通读者的欢迎，一再重印，至今已印数十万册。198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三国志选注》，注释工作由先生指导，四川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三位是具体承担者，先生亲自撰写了前言。该选本作为当时“二十四史”选注本中分量最大的一种，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简报》1985年第141期发表了王而山先生的长篇书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三国志选注〉》，认为此书有几个特点：一、篇目选择的典型性；二、注释的通俗性；三、选注的学术性。指出先生所撰《前言》对《三国志》的作者、成书、旧注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一些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学术价值看，是《三国志》研究的新成果。关于《选注》对裴松之注的详释，对前人旧注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对卢弼《三国志集解》的间有补正以及对地名考证的精确等，文中都予以充分地肯定，并由此总结说“《三国志选注》是一部好的古籍注本”，“给进一步研究《三国志》和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廓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1987年，巴蜀书社又出版了先生主编的《三国志导读》。该书内容分为导读与选文两大部分，先生自己撰写了导读中的“陈寿《三国志》评介”一节，并指导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等三位教师撰写其余三节，即“如何阅读《三国志》裴注”、“读《三国志》的几个方法问题”、“研读《三国志》参考书简介”。选文部分则是从《三国志选注》中抽出五篇，加以补充修订而成。上述三书构成了先生在《三国志》整理研究方面的著作系列。配合《三国志》注释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生又开始撰写研究陈寿其人其书的论文。1962年，先生在《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了《陈寿与〈三国志〉》，后来《三国志选注》一书的前言，即以此文为基础增订而成。1985年，先生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撰写了《陈寿评传》。在这几篇文章中，先生除对陈寿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介绍，对《三国志》的立传标准、史料取舍、文字特色等进行评论分析之外，还特别就一些向来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辨。1983年，先生在《读书》第9期发表《〈三国志〉的书名》一文，考证辨析《三国志》

书名问题。针对当时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在“出版说明”中说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种，改称《三国志》的观点。先生指出：这虽然是小的疏误，却有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误解。文中以《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陈寿传》、《宋书·裴松之传》、《魏书·毛修之传》、《隋书·经籍志》的确凿记载为证，说明自两晋南北朝以至唐初，都称陈寿所著为《三国志》，其书得名并非晚在北宋之时。后来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及时采纳了先生的正确意见，将有关的文字删除。先生又曾在《书品》1991年第2期发表了《〈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认为完成于西晋时期的《三国志》开始是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1924年新疆鄯善县和1965年新疆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出土的两种晋代手抄本《三国志·吴书》残卷，便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抄本。至于传抄本的“祖本”，根据《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和《北堂书钞》卷一百四“贲纸写国志”条引王隐《晋书》的记载，应是在陈寿卒后，洛阳令张泓派人至其家抄写的本子。这个本子由西晋政府正式收藏。以后《三国志》的传抄，大概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因此可以说它是《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上述两种出土的晋代写本残卷，与“祖本”出现的时间相距不远，很可能是从官府所藏“祖本”转抄而来。至于《三国志》的刻印本，即使是现今传世时间最久的宋刻本，在文字的存真上亦不及两种晋代写本，较之“祖本”及陈寿原稿，就更有相当的差异了。这两篇文章题目虽小，文亦不长，却均可谓言之有物。^①

中国古典文学是先生早期和晚期治学的重点。先生对先秦及魏晋以来历经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诗骚、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之特质与流变，历代之重要作者如屈原、曹植、王粲、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颜之推，以迄金元之元好问，清代之汪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都有专文论述。其中诗词研究的成果尤为突出。先生的第一篇论文《论诗》发表于1929年5月《学衡》杂志第69期，文中析论诗之质、诗之用，甫一发表，即受到当时蜀中著名学者刘咸炘先生的推重，不仅在所著《风骨集》中将

① 本段参考方北辰《缪钺与古籍整理》，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并在“题记”中说：“《风骨集》印成，适于《学衡》杂志见此篇，究本括末，简要超常，不独非时流钞剿芜冗者比，即先士名论亦未有是。吾撰《诗评综》，广采精择，贯穿编次，其所论辨，不越乎是。因附印集后，以为读斯集之准则。”^①先生其他论诗之文，无论是论述某一时代之诗，还是评论某一诗人的作品，也皆能通观诗之全貌，比较同时代诗人之异同，上考其渊源，中察其流变，下观其影响，获得超越前修的独到见解。《论宋诗》一文在此方面可谓范例。文中首论唐、宋诗之区别：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彩；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以下更举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而宋人皆写入诗中的诸多例证，以说明宋诗内容之更为广阔；又从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立论，以阐释宋诗技巧之更为精细。然后总结道：“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故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觐。”此文的观点长期被同行引用，而文笔之精美，象譬之切当，则更为读者所乐道。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诗鉴赏辞

^① 刘咸忻《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3册第2036页。

典》，选此文代序，说明时近半个世纪，该文的水平仍居于宋诗研究的前列。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是迄今所见先生的第一篇词学论，为先生所著《元遗山年谱汇纂》的副产品，发表于1936年《词学季刊》第3卷第2期、第3期。以后先生又陆续发表《论词》、《论李易安词》、《论辛稼轩词》、《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等词学论文，探讨词体之特质，深析李清照锐感之心灵，论证辛词所具含之豪放与闲适双重意境，评析白石之以江西诗法入词，而“凡此种种评断及识见，盖皆可谓为‘探索隐微’能‘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者。”^① 1948年先生选取十篇论文集为《诗词散论》，由开明书店印行，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曹聚仁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撰之《文坛五十年》中曾指出，当代文艺批评家之中，朱自清、王力、周作人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著有《谈艺录》）、缪钺（著有《诗词散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② 1982年，叶嘉莹教授曾经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馀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都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③

1952年以后，先生虽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却没有间断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对研究动态的关注。“文革”前，先生所发表的有关古典文学的论文中，有两篇坦陈己见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50年代后期，在古典诗词评论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盛行专就其思想性立论的研究方法，视艺术性为禁区。先生在1957年发表《杜牧诗简论》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论诗时，必须记

① 叶嘉莹《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84页。

③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各种特点”。^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这样的文字是不随大流的，它表明先生在学术上尚想保持一份独立的思想。1962 年先生又发表《关于李清照词》一文，对时人评论中全面否认李清照词中之“爱国的情感”的观点进行辩驳，提出：“如果说李清照词中有忠愤之语，固然有点过誉，但是完全否认其中有爱国的情感，恐怕也是不公允的。”针对贬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的说法，先生认为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也不能用当时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女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漂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② 这种深具理解之同情，招来了以后的非议。在“文革”的大字报中，有人指责先生研究的都是古代文人，说杜牧是先生之兄，李清照是先生之妹。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生开始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谿词说》。从 1982 年至 1986 年的五年间，先生撰写论文二十三篇。1987 年《灵谿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但在体例、写法和立论阐释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体例方面独创一格，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各种体裁的内容熔为一炉。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的散文说明。书中每篇文章按论述内容之时代次序编排，可见词史发展之脉络。其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近有研究者在总结 20 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时指出：“缪钺、叶嘉莹的《灵谿词说》虽然是作家专论的合集，但因将唐宋词人一一论述，论述中又注意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承继关系的寻绎，实际上是一部高水平的唐宋词史。二位作者学力深厚，方法新颖，因而新见迭出，常有发人深思

①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 162 期，1957 年 6 月 23 日。

② 《成都晚报》，1962 年 2 月 15 日。